

一些美国媒体日前再度翻炒所谓“债务陷阱论”的陈词滥调,企图把一些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甩锅给中国。但经采访调查,美方诋毁中国的言论根本站不住脚。广大发展中国家根本不相信美方谎言,而且高度认可中方为帮助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

中国贷款占比不高

西方媒体近年来反复翻炒的所谓“债务陷阱论”是诋毁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贷款,这些国家无力还贷后便落入“陷阱”,其资源乃至主权被中国控制。美联社最近就抛出这样一篇文章,宣称非洲的肯尼亚、赞比亚,以及南亚的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都是“债务陷阱”的“受害者”。

事实果真如此吗?

巴基斯坦经济事务部向新华社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巴外债总额为1257.02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的贷款为203.75亿美元,占巴外债总额的16.2%。巴外长比拉瓦尔本月初访问日本期间对日媒表示,有关巴基斯坦陷入中国“债务陷阱”的指责是“政治宣传”,巴方既接受中国的贷款,也接受其他国家贷款。中国向巴方提供的帮助大部分都是投资或条件优惠的软贷款。比拉瓦尔强调,巴基斯坦债务问题不会导致其重要基础设施被他人掌控。

斯里兰卡央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斯现有外债276亿美元,其中私人债权人占比最大,为53.6%,多边债权人占比20.7%,中国占10.9%。斯外长萨布里多次驳斥中国“债务陷阱论”,指出中方尊重斯方请求,从来没有强迫斯贷款;没有中国的帮助,斯不可能实现发展。

再来看非洲。肯尼亚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该国外债总额为366.6亿美元,其中46.3%的债务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来自中国各种实体的债务占17.2%。赞比亚情况与肯尼亚相似。根据非洲政策研究所2022年的一份报告,2011年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约四分之三的偿债资金支付给了债券持有人和商业贷款人。它们才是非洲最大的债权人。

今年4月,时任尼日利亚副总统奥辛巴乔在伦敦国王学院发表演讲时说:“在我看来,大多数非洲国家对中国的密切关系无怨无悔。中国在西方不愿出现的地点和时间出现,非洲需要贷款和基础设施,而中国提供了它们。”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纳伊朱说,所谓中国制造“债务陷阱”是一种“政治污蔑”,被用来转移注意力,以免除西方理应承担的责任。“我们希望外界关注到非洲债务更多来自西方国家机构和民间金融机构”。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2020年5月在一份关于“一带一路”的报告中指出,多项研究显示,“没有任何例证表明中国故意使另一个国家债务缠身,以此获取某种不公平的优势或采取没收债务国资产等行动”。

西方高息才是问题

美联社报道称,巴基斯坦等10多个“对中国负债最重”的国家“发现偿还债务正在消耗越来越多的税收收入”,“这些收入是维持学校开放、提供电力以及支付食品和燃料所需的”。“在巴基斯坦,数百万纺织工人被解雇,因为该国外债过多,无力维持电力供应和机器运转。”

巴基斯坦纺织厂协会秘书长沙希德·萨塔尔驳斥了这一毫无根据的指责。他表示,现阶段巴纺织业面临的流动性短缺问题有几个原因,包括巴基斯坦卢比对美元汇率大跌导致电厂难以购买燃料发电、消费税退税延迟以及棉花歉收等。将纺织业遭受的重挫归咎于中国“荒谬可笑”,“中国一直在与巴基斯坦合作,持续地帮助我们解决经济问题”。

巴基斯坦亚洲生态文明研究与发展研究所首席执行官沙基尔·拉迈说:“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来自西方金融机构的外债。这些外债现在给我们造成了真正的问题。巴基斯坦没有能力偿还这些债务,因为这些贷款的利率很高。”

巴基斯坦前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长阿萨德·奥马尔2021年曾表示,中巴经济走廊能源项目贷款的平均利率低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其他西方机构给出的平均利率。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很大关联。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造血”功能较弱,要发展离不开借外债。为追求高回报,西方金融机构经常鼓动发展中国家发行大量短期高息债券,让一些债务国面临巨大偿债压力,不得不举新债还旧债,“雪球”越滚越大。英国“债务正义”组织去年发布报告说,根据

发展中国家不相信美国炮制的「债务陷阱」谎言

新华社记者 刘天 田栋栋 韩冰

世界银行数据测算,非洲国家政府外债中12%来自中国,35%来自西方尤其是私营机构。中方贷款的利率为2.7%,而西方贷款则为5%,几乎是中方的2倍。

赞比亚就是一例。赞比亚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奇贝扎·姆富尼指出,在赞比亚外债中,来自西方和多边金融机构的债务占比远大于中国,而且西方和多边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高于中国提供的贷款利率。

“非洲各国长期疲于支付西方金融机构贷款的利息。”姆富尼说。

“西方国家才是非洲每一次‘债务陷阱’的制造者,”津巴布韦执政党津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信息与宣传书记克里斯托弗·穆茨万古瓦最近在北京参加活动时对新华社记者说,“在中国(提供帮助)之前,对于非洲来说,如果想要资本,去巴黎,那里的资本很贵;去纽约,那里的资本更贵;如果去伦敦,那里的资本‘贵翻了天’。”

美国金融霸权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美国利益集团和金融机构联手,数度在新兴市场国家制造债务危机,从这些国家巧取豪夺巨大经济利益。上世纪90年代,阿根廷利用国际低利率环境大幅举债,还被美国灌下“新自由主义”迷魂汤,到2001年金融危机爆发时负债额高达千亿美元,因无法还债被迫于2005年和2010年两次进行债务重组,至今仍受债务问题困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非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叶剑如指出,美国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是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集中爆发的导火索。美国先是实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让低息美元大量涌入非洲及新兴市场国家,然后激进加息,吸引美元回流美国,导致发展中国家流动性不足、资金链断裂、货币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偿债压力飙升。

中国是摆脱“贫困陷阱”的伙伴

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不仅要通过债务处理等手段治标,也要治本,提升其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在“一带一路”合作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主要用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有利于其改善发展经济的基础条件,增强经济“造血能力”。

有关统计显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沿线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让将近4000万人摆脱贫困。这些项目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中老铁路让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斯里兰卡普特拉姆电站点亮了万家灯火;蒙内铁路拉动肯尼亚经济增长超过2个百分点……

中国对外合作项目是否有助于当地发展、改善民生,当地民众最有发言权。去年6月,南非开普敦大学一项研究定量分析了中国贷款对15个非洲国家发展的影响,认为中国帮助非洲发展基础设施的努力切实促进了非洲经济增长,中国一直是帮助非洲发展的重要力量。

南非驻华大使谢胜文最近在参加第三届中非经贸博览会时说:“南非自2015年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以来,基础设施得到很大提升,这对我们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他表示,越来越多中资企业加大对南非各领域投资,不仅帮助南非改善交通基础设施,还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对推动南非经济现代化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中国还履行职责有效执行缓债措施。世界银行研究指出,2008年至2021年,中国对低收入国家债务进行71次重组。2020年,中国积极响应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仅当年缓债额便超过13亿美元,占二十国集团缓债总额近30%,是二十国集团中贡献最大的国家。

“事实是中国没有令任何人陷入所谓的‘债务陷阱’,我们非洲大陆知道自身需要什么,”加纳智库非中政策咨询中心执行主任保罗·弗林蓬今年6月在一个媒体论坛上说,“以基础设施领域为例,中国总是给我们提供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替代选项,这使非洲人民受益无穷。”

“我们期待获得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曾担任津巴布韦驻华大使的穆茨万古瓦说,“因为来自中国的投资正在使非洲实现现代化,将非洲带入全球经济舞台,这是西方国家之前从未做过的。”

今年4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就非洲债务问题回应说:“中国不是非洲国家‘债务陷阱’的源头,而是帮助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陷阱’的伙伴。一些美西方政客编织各种话语陷阱,企图干扰破坏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合作,他们的伎俩已经被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社会看穿,越来越没有市场。”(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7月11日,车辆在港珠澳大桥上行驶(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梁建华 摄)

“澳车北上”火爆为大湾区发展添马力

据新华社澳门7月16日电(记者 李寒芳)生活半径扩大,时空距离缩短,商旅往来便捷……自2022年12月20日“澳车北上”政策正式施行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的澳门单牌车通关数量呈阶梯式增长,越来越多的澳门民众畅享“踩一脚油门就能到广东”的幸福感。

“澳车北上”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领域的一项政策。符合条件的澳门车主在预约通关获准后,即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广东,畅享便利出行。据统计,“澳车北上”政策落地至今,系统成功注册账

号人数已超过4万人,合资格的车辆逾1.7万部,显现澳门居民的热情。

在便利人员往来同时,“澳车北上”也成为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助推剂”,为大湾区经济注入崭新活力。许多澳门青年纷纷驾车“北上”,寻找投资机遇和工作机会。

澳门创新发展研究会秘书长余渭恒表示,“澳车北上”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交流,既带动更多澳门人士在内地旅游、投资兴业和商洽合作,也促进港澳人士拓展内地庞大的市场,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去风险”难掩遏华本质

——警惕“去风险”的话术陷阱系列评论之一

新华社记者 高文成

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美高官近期多次表态,对华不寻求对抗、冷战或“脱钩”,而是聚焦所谓“去风险”,但是看看他们是如何推动“去风险”的就会发现,变的只是口径,不变的是行径——将对华经贸活动贴上“风险”标签、推动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打造破坏正常中外技术交流的“小院高墙”……这不是“脱钩”又是什么?以“去风险”之名行对华“脱钩”之实,继续遏制孤立中国,才是美国话术陷阱背后的真实图谋。

风险是所有经济活动固有的,防范风险不是什么新鲜事。在遭遇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等事件后,一些国家主张加强产业链建设、提升供应链韧性,提出“分化风险”等。合理的安全关切可以理解,但美国却利用这种心态泛化安全风险,贩卖安全焦虑,将“去风险”的概念扩大化工具化,并通过不断地炒作、利用、异化这一概念,将其与中国关联,意图将中国与“风险”画上等号,将“去风险”路径简化为“去中国化”,以此对华遏制战略换上新装。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刊文说,“去风险”这一新话术“暗示与中国的贸易存在固有风险”,中国认为“去风险”与“脱钩”之间没有实质性区别是“有道理”的。

话术变了,背后的目的却一点没变。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一边说寻求“去风险”不是“脱钩”,一边却大谈美国要在关键技术领域设置所谓“小院高墙”战略。在自身遭受巨大损失,严重干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招致大量批评之后,美国一系列操作的目的是还是要将中国排除出关键供应链之外,限制中国向产业链价值链更高端攀升,遏制打压中国发展壮大,以维持自己的霸权垄断优势。

韩国大邱大学经济金融系教授金良姬说,如果在“脱钩”前加上修饰语“选择性”,与“去风险”之间的实质性差异就会消失。《南华早报》刊文说,不管美国使用何种话术,背后动机仍是敌视其他地区发展愿望、维持美国霸主地位。

美国为了“脱钩”耍出了“四板斧”: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扩大美国对中国投资限制的范围,加强对先进芯片技术等领域的贸易限制,阻碍中美科技合作交流。如今美国虽表态不愿“脱钩”而要“去风险”,相关政策一项都没有松动,反而变本加厉。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5月初宣布一项名为“中国竞争法案2.0”的跨党派提案,试图通过限制投资和技术流向中国赢得对华“竞争”。6月12日,美国商务部将主要涉及航空相关领域的31家中

国实体列入原则上禁止出口的“实体清单”。美国不仅自身滥用出口管制措施,还不惜损友自肥,胁迫诱拉一些盟友加入对华出口限制的小圈子。

此外,在所谓“印太地区”力推“印太经济框架”和“芯片四方联盟”;在大西洋地区强化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机制;在美洲地区发起“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在这些“小圈子”中,美国塞进了诸多排他条款,频频炒作所谓中国“经济胁迫”,绑架诱拉盟友组建“供应链联盟”,打造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平行体系”,美国与中国的“脱钩”或“选择性脱钩”步伐实际上正在加快。

不管措辞怎么变,美国以冷战思维看待中美关系的做法没有变,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取向没有变,围堵打压遏制中国的目标更没有变。美国为了维护自身霸权,违背各国意愿推进“阵营化”,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给世界繁荣稳定构成真正的风险。

实际上,美国“去风险”的战略忽悠已经引起广泛警觉。在美国工作的英国籍学者尼亚尔·弗格森撰文说,欧洲人对美版“去风险”提出质疑,原因有三:一是他们将美国《通胀削减法案》视为拜登版“美国优先”;二是他们意识到沙利文的“高墙”也会使欧洲无法参与人工智能竞赛;三是他们担心美国技术上遏制中国的政策将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警告说:“美国的技术基础与中国密不可分地连入一个覆盖全球的技术网络,如果随意切断并重组这一网络,后果将是可怕和危险的。”

报告作者乔恩·贝特曼认为,如果切断与中国的技术联系,将伤及美国自身:一是苹果等美国企业不可能在中国之外以类似成本复制供应链,“脱钩”将对美国重要科技公司带来极大伤害;二是美国在部分领域需要中国的科技产品和原材料,“脱钩”将给美国应用相关技术、制造相关产品造成巨大困难;三是“脱钩”将阻碍两国科技人才交流,对美国科研、教育等领域带来巨大挑战。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9日总结访华之行时说,听到了中方认为“去风险”相当于“脱钩”的关切,并表示解决相关问题非常重要。在与美国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国向来听其言观其行,希望美国是真听懂了中方的意思,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并不寻求与中国“脱钩”,从根本上纠正其对华错误认知,改变其错误对华政策。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